

理解内生性: 实践论与乡村环境变化研究

范叶超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现今主流的现代化解释框架对我国乡村环境问题日渐凸显的内生性之维缺乏关注, 该框架已暴露出明显局限。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对环境社会学具有借鉴意义, 提示我们关注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环境问题以及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转型。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理论, 西方社会理论界新兴的实践论主张基于日常实践阐释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 为理解我国乡村日常生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探索价值的新思路, 亦对当前乡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承认现代化解释框架目前仍存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前提下, 实践论的引入能够针对性地弥补该框架的理论短板, 推进我国乡村环境变化研究。

[关键词] 乡村环境变化; 乡村环境治理; 生态现代化; 内生性环境问题; 实践论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21)04-0052-13

一、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之维

中国乡村的环境问题大约于 20 世纪 80 年代浮出水面。彼时, 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 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乡村地区面临的环境压力也随之骤增, 曾造成了一些突出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度开发问题。与此同时, 广大城市地区以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处理不善等为表征的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 并逐渐向乡村地区蔓延。进入 21 世纪前, 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许多乡村地区的环境状况在这一时期开始迅速恶化并呈现出明显的失控态势。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乡村地区环境质量的急剧退化历程, 不难发现, 以点源污染为典型特征的许多乡村环境问题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鲜明的外源性: 它们主要不是由乡村内部的社会动态过程驱动, 而是与“工业下乡”、城市污染扩散等乡村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些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乡村地区的环保投入, 加上一大批高污染的乡镇企业也随着产业升级被关停, 由外源性社会因素导致的、局部乡村地区的一些环境问题得到了初步遏制。但广大乡村地区的整体环境质量并未随着这些早发环境问题的暂时缓解而获得根本性改善, 一些新浮现

[收稿日期] 2021-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实践论的形成、发展及应用研究”(19CSH001)

[作者简介] 范叶超(1990—), 男, 安徽宣城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社会理论。

的环境问题继续干扰着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新的时期,乡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首先,乡村面源污染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是一种污染物浓度较低但来源分散、发生位置和地理边界通常不明晰的水环境污染形式,突出表现为水体的富营养化^[1]。在一些乡村地区,面源污染甚至已取代工业污染成为更加紧迫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监测营养状态的107个湖泊(水库)中,超过两成(22.4%)的湖泊(水库)呈轻度富营养状态,中度富营养状态的湖泊(水库)占5.6%,其中,太湖、巢湖、滇池等大湖均呈现出轻度富营养状态^①。早在21世纪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披露过这些水体的富营养化趋势,但工业污染却并非主源(工业废水对总氮、总磷的贡献率仅占10%~16%),乡村面源污染需要为这些水体环境的恶化负相当大一部分责任^[2]。

其次,乡村土壤环境退化严重。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的耕地普遍面临着酸化、盐碱化、富营养化、金属污染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国20.23亿亩耕地中约有4.4亿亩被评价为基础地力较差的七至十等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1.95%),其中,黄土高原区、内蒙古自治区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华南区、长江中下游区等乡村地区的耕地退化情况尤为突出^②。在我国北方一些有着大片草原分布的乡村地区,草原退化的程度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有研究基于对纵贯遥感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过程明显加快:锡林郭勒草原目前已全域退化且中重度退化面积仍在不断扩大,呼伦贝尔草原也新增35%左右的退化面积^[3]。在很大程度上,耕地和草原的退化与超过土壤环境负载能力的农(牧)业生产活动相关。

再次,大多数村庄都遭遇了“垃圾围村”的困局。继“垃圾围城”之后,近年来一些媒体报道的焦点又转向了“垃圾围村”问题,乡村的垃圾处理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③。2006年至2007年在全国657个县6590个村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乡村人均日生活垃圾产量约为0.86kg(其中36.72%的垃圾被随意堆放),而由工业废弃物、禽畜养殖的粪便、秸秆杂草等构成的生产垃圾人均日产量也达到了约2kg^[4]。另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58.8万个行政村中仅有21.8万个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处理(约占37.1%),其中有14个省份只有不到30%的行政村开展垃圾处理,少数省份甚至不到10%^④。尽管“垃圾围村”问题在2013年国家建设“美丽乡村”战略实施以后有了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村庄目前的垃圾处理形势与城市一样仍不容乐观。

此外,局部乡村地区目前还经受着诸如焚烧秸秆引起的大气污染、能源需求量增长带来的能

①参见:生态环境部.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2021-02-11].<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2006/P020200602509464172096.pdf>.

②参见:农业农村部.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EB/OL].[2021-02-11].http://www.moa.gov.cn/nybg/2020/202004/202005/t20200506_6343095.htm.

③参见:何崇元.农村垃圾治理迫在眉睫[N].人民日报,2015-04-07(20);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垃圾围村,如何突围[EB/OL].[2021-02-15].<http://tv.cctv.com/2016/06/18/VIDEvoDGYMq3FMAIgobypLUB160618.shtml>.

④参见:农村有多少垃圾未作处理[J].环境经济,2015(1):34.

源短缺、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污染等其他环境问题的困扰, 这些问题与上述的面源污染、土壤问题、垃圾处理等问题共同构成了当前阶段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普遍面临的环境问题。

相较以往, 新时期我国乡村地区上述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要更为复杂。一方面, 乡村外部的社会动态过程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乡村环境问题仍带有清晰的外源性烙印, 如由大都市迁移至周边村庄引发的“雾霾”问题、“资本下乡”引发的乡村自然资源短缺问题, 等等。但另一方面, 乡村内部的社会动态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渐显现, 许多新涌现的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似乎更为明确地指向了乡村生活本身。以农业生产为例, 现代乡村农业生产中会涉及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地膜等多种环境有害产品的使用, 其中, 化肥和农药施用量不仅可能引起耕地退化, 也是乡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 农膜(包括塑料薄膜和地膜)的大量使用会增大田间径流, 加速土壤和化学物质的流失。此外, 由于这些产品的包装材料大多难以降解, 随意丢弃还会造成垃圾污染。表 1 是 2004—2018 年间我国乡村农业生产对上述这些产品的使用情况。由表 1 观察可知, 近 10 多年来, 我国乡村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农膜的需求量一直较大, 尽管近几年有下降的迹象, 但仍整体偏高。

表 1 乡村农业生产对部分环境有害产品的使用情况(2004—2018 年)

年份	化肥施用量 /万吨	农药使用量 /吨	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	地膜使用量 /吨
2004	4 636.6	1 386 028	1 679 985	931 481
2005	4 766.2	1 459 945	1 762 325	959 459
2006	4 927.7	1 546 268	1 845 482	1 007 764
2007	5 107.8	1 622 837	1 937 468	1 056 151
2008	5 239.0	1 672 259	2 006 924	1 105 761
2009	5 404.4	1 708 998	2 079 697	1 127 934
2010	5 561.7	1 758 219	2 172 991	1 183 756
2011	5 704.2	1 787 002	2 294 536	1 244 845
2012	5 838.8	1 806 057	2 383 002	1 310 822
2013	5 911.9	1 801 862	2 493 183	1 361 788
2014	5 995.9	1 806 919	2 580 211	1 441 453
2015	6 022.6	1 782 969	2 603 561	1 454 828
2016	5 984.1	1 740 459	2 602 609	1 470 110
2017	5 859.4	1 655 066	2 528 365	1 436 606
2018	5 653.4	1 503 553	2 464 795	1 403 991

注: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5—2019 年公布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陈阿江教授在分析太湖流域水污染问题时较早地关注到了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指出除了外源的工业污染外,太湖流域村民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加剧太湖流域水体环境的恶化,构成了内生污染源^[5]。实际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草场因为牧民们的过度放牧而急剧退化;乡村居民对塑料、玻璃、金属等难降解物品的大量使用造成了乡村垃圾污染;乡村居民每天做饭、洗澡等产生的家庭生活污水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也在污染当地的水体环境……整体来看,我国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维度正在日渐凸显,这表明乡村内部的社会动态过程在乡村环境退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关键。我国乡村环境问题日渐明晰的内生性之维提示我们,探讨新时期乡村环境问题及其治理需要特别关注乡村内部社会生活的影响。

二、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环境变化

环境变化是指生物物理环境的一系列显著改变。环境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为性的环境变化现象,它既包括特定社会因素驱动下环境质量的显著退化(“环境变差”),也包括在一定社会干预下环境质量取得的实质改善(“环境变好”)。国内环境社会学学者针对中国乡村环境变化相继提出了一些不同理解,这些理解大体上遵照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这样一个主流解释框架^[6-11],该框架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环境退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主动或被动付出的环境代价,而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现代性与传统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应当说,对当代我国乡村环境问题的讨论不能脱离现代化这样宏大的社会现实背景,从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角度来“拆解”乡村环境变化议题确有一定解释力,但也存在至少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现代化解释框架无从分析前现代乡村社会的环境问题。一个有待破除的“神话”是:前现代乡村社会所依附的自然生态系统总是良性运行的,并不存在任何环境问题。在现代化解释框架的一些支持者看来,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甚至似乎可以等同于我们今天孜孜以求的生态文明^[12]。事实上,从采集狩猎社会至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系统的运行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存在,环境问题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都有其特定表现形式。可以说,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不加区分地等同于环境友好的田园生活或许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浪漫想象,但却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环境史学研究表明,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我国生态环境遭到持续破坏,局部乡村的生态环境曾一度失衡^[13]。时至今日,在城镇化、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水平仍旧欠发达的局部乡村地区,在延续了上千年、相对静稳的传统农业社会体系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影响一直存在,人与自然关系并不总能维持在平衡状态,有时也会失衡并演变为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例如,农业不当灌溉导致的水资源短缺、过度捕捞或狩猎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乱砍滥伐造成的森林锐减以及矿产开采对水域环境的污染,等等。换言之,乡村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都是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也包括历史遗留的问题。鉴于此,只关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伴生的环境后果属于一种片断式观察,应当将乡村环境状况的改变置于连续的社会时空情境中来考察。

其次,乡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在现代化解释框架中被放大了。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确实使得乡村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风险)不断叠加,但将现代化视为乡

村环境退化的“祸源”却容易走向拥抱“去现代化”“去增长”这样一类激进的环境改革主张。需要承认的是,在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尚待提高的乡村地区,发展仍是第一要义(尽管发展的内涵不拘泥于现代化),对促进乡村贫困、性别不平等、教育资源匮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社会学中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而不必然相互排斥,现代化自身亦蕴含了妥善解决环境问题的潜力^[14]。对一些欠发达乡村地区来说,在生态环境自我修复难以达成的情况下,善用现代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如项目、资金、技术以及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压力转移等)来治理环境是一条值得借鉴的道路。简言之,要看到现代化给我国乡村带来的环境危机,但不能就此全盘否定乡村发展的价值,应当积极地去探索乡村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有“双赢”的可能性。

再次,现代化解释框架还低估甚至忽视了乡村居民及其行动在环境治理中的能动性。现代化解释框架通常认为,传统乡村内生的、具有环保色彩的地方知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让位于外来知识,导致乡村居民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行动规范而堕落于“环境施害者”,并被排除在由外来决策者们主导的环境治理的权力体系外^[5-9]。客观地说,在涉及一些外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时,乡村居民可发挥的能动性的确较为受限,甚至有时只能采取激烈抗争的方式维护自身被侵害的环境权益^[15]。但也有研究证据表明,在解决与乡村内部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时,目前政府主导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尤为需要乡村居民的广泛参与和行动支持,这直接关乎环境治理能否取得实效^[16-17]。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的东部乡村地区,诸如垃圾分类设施、太阳能热水器、LED灯、太阳能电池板、节能家电、绿肥等环保技术和产品已随着供给加大而变得可及,乡村居民理论上也可以通过使用这些环保技术和产品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整体上看,乡村居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能够扮演的角色还有待重新评估。

最后,现代化解释框架对现代性的理解滞后于当前乡村社会现实基础的深刻变化,对乡村环境变化新的社会动态过程的理论化还不足。21世纪人类社会是一个新纪元,在全球范围内,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日益崛起^[18-19]。虽然网络化与城镇化、工业化、科技发展等现代化变迁存在一定相似性,但它却带来了一些更加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变化。网络化让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局地生态环境状况除了会受到“在场”社会动态过程的影响,正在遭遇来自地方空间之外越来越多“缺场”社会动态过程的作用^[20]。当前,以农村电子商务等为表征的网络化进程已延伸至我国绝大部分乡村地区^[21]。乡村网络化不仅重塑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缺场”社会关系。在网络化时代,乡村生态环境除了仍受到原本地理上相邻的、一时一地的社会系统影响外,还会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区域的、全国的乃至全球的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对此,现代化解释框架尚未给予过充分关注和讨论,亟待专门研究阐释。

除最后这一点外,现代化解释框架在阐释我国乡村环境变化时暴露出来的以上理论短板集中反映了该框架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对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之维缺乏足够的关注。具体来说,现代化解释框架倾向于从乡村社会整体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乡村环境变化的社会动态过程,将乡村环境退化假定为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中才出现的一个由外到内、从无到有、被动式的“沦落”过程:尽管该框架并不否认乡村内部的社会动态过程在其环境变化中的作用,但却坚称这种内部动态过程隶属于外部动态过程,是现代化席卷或侵蚀乡村的后果。这样一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乡村

环境问题的社会内生性,与前现代化时期乡村内部社会生活有关的那些环境事实被有意或无意裁剪掉,乡村发展的负面环境后果被过度解读,乡村居民在环境治理中的能动性也因此被低估。

总之,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对乡村的影响不容否认,但乡村社会生活也并非现代化解释框架所假定的那样完全是断裂的、脆弱的和依附的,同时也有承继的、韧性的和自主的面向。只有找回乡村社会生活的这些面向,我们才能实现对现代化解释框架的超越,更好地把握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之维,更为全面地理解乡村环境变化。在此方面,当代社会学中的日常生活视角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三、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对环境社会学的启示

所谓日常生活,指的是那些对社会成员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社会生活^[22]。日常生活一直是人类学家们的核心关切研究领域,相比之下,日常生活却曾被社会学家们认为是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研究领域,故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但过去30多年间,日常生活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3-31]。有学者认为,继关注“社会整体”(有机体、系统)的“第一社会学”和关注“社会原子”(行为、行动乃至构成它们的意义、脚本、文本等)的“第二社会学”后,当代社会学对日常生活与日俱增的讨论正在催生一门“第三社会学”^[32]。

目前,社会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较之前已相当深入,形成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日常生活理论和思想。根据一项研究的梳理,目前国外社会学界主要从7个层面来拆解日常生活议题:一是空间层面,即关注作为日常生活主要(但非唯一)发生场所的家,并将家及在家中开展的活动视为典型日常生活;二是时间层面,即强调日常生活的发生具有节律性和重复性(所谓“日复一日”),并在研究日常生活时特别关注“白日的”(而非“夜间的”)节奏和重复;三是意识层面,即假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流露出一种“自然态度”,这是一种未经反思的、尚未理论化的和实践性的心智状态,人们也据此将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通常会回避对这些并非当务之急的事物进行理论化或深入思考;四是器物层面,即关注人们在日常行动中使用的特定技术、工具和物品,这些器物分别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特定目的,从而使日常生活变得可能;五是方法论层面,即主张认识日常生活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社会研究者们需尝试开发恰切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来理解日常生活世界;六是学术提炼层面,即将日常生活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日常性”成为概括了大量经验、事件和行动的一个社会学术语;七是认识论层面,即强调日常生活是经验形成的基础来源,既包括瞬间的、简单直接的生活经验,也包括可积累的、需要反思的、被批判性评估的和能够传递的经验^[33]。

环境社会学自学科创建之初便致力于探讨社会生活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但长期以来却较少涉及对日常性的社会生活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代谢断裂理论、生产跑步机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等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叙事基本上都是围绕宏观社会生活变迁的线索铺开,特别是检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直至近10多年来随着可持续消费研究的兴起,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们才开始将日常生活的环境影响纳入研究视野,探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调整之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仍倾向于从个体属性抑或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去解释各式各样的“环境行动”^[34],鲜有研究细究这些环境行动背后的日常生活逻辑。那么,为什么环境社会学一直未能真正重视日常生活与环境变化

之间的关系呢? 有研究者尝试对此做出解释, “即便日常生活有时被微小的环境行为凸显出来, 但它毕竟是如此‘日常’: 它波澜不惊, 有时特立独行, 且大多数时候是平凡的, 与任何可持续性转型所需的巨大变化都极不相称……定义我们一天的那些惯例和小的选择是由可以被分析和塑造的更大力量所作用的东西, 它们本身并不是权力和变化的领域”^[35]。

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对环境社会学具有重要启示, 对此, 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 随着环境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日常生活的环境影响已被充分揭露, 环境社会学必须加强对日常生活这一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地解释植根于其中的许多环境问题。在少数特殊条件下, 生物物理环境的变化可能是突发的(如环境事故造成的环境质量突然下降), 但在大多数条件下, 生物物理环境的变化都是渐进的, 是由持续累加的环境影响诱发的质变。与生产跑步机理论的描绘类似, 日常生活也可看作是一台不停运转的“跑步机”, 它的不断再生产同样是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攫取”和“添加”作为物质基础的, 在很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鉴于此, 环境社会学不能够再忽视日常生活的环境影响, 亦不能再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环境问题简单还原为宏观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后果, 而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认真审视这些问题形成的特定社会机制。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人们在环境的辩论中越来越认识到, 我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有着深远影响。不仅我们生产的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的消费数量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展不同活动的方式也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 关注和理解日常生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变得越来越重要”^[36]。

另一方面, 治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如何因势利导推动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转型是环境社会学需要深入思考的新课题。日常生活衍生的环境问题终究还得在日常生活中解决, 这就必然会涉及对现有日常生活的变革, 即通过恰切的干预方案推动日常生活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变迁。但关于日常生活的既有社会学研究表明,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础和稳定的领域, 难以撼动。环境政策研究者们曾主张从个体的行动干预(“自下而上”)和结构的整体调整(“自上而下”)两个主要方向来推动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转型, 但这些改革方案在落实过程中普遍未能取得太大成效^[37]。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 政策制定者们对所干预的对象——日常生活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还比较有限, 应用了不恰当的政策工具。因此, 环境社会学今后应进一步夯实日常生活可持续性转型方面的研究, 积极探索日常生活“绿色变革”的其他可行方案, 不断提高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那些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效。

此外, 环境社会学也可以多加关注环境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进一步丰富我们关于日常生活与生物物理环境互动的理解。综合来看, 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拓展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边界, 为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新思路。接下来, 本文将撷取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一个广受关注的日常生活理论——实践论予以简单介绍, 并尝试讨论该理论对我国乡村环境变化研究的主要启示。

四、迈向日常实践的乡村环境变化研究

1. 实践论: 一个日常生活理论

实践论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基于广泛的学术争鸣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理论范

式,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颇具影响力。吉登斯和布迪厄被公认是实践论的两位重要奠基人,他们从马克思、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实践思想中汲取灵感提出了第一代实践论,共同主张立足实践的原则来认识社会生活,以超越社会理论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问题^[38-39]。循沿吉登斯和布迪厄的思想脉络,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安德烈亚斯·莱克威茨(Andreas Reckwitz)、伊丽莎白·修芙(Elizabeth Shove)、大卫·尼科里尼(Daive Nicolini)、亚伦·沃德(Alan Warde)、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赫特·斯巴哈伦(Gert Spaargaren)、史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等西方理论家先后积极投身到实践论后续的建构中,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40]。

实践论最核心的分析概念即社会实践。根据夏兹金的定义,社会实践是“开放性的、时空性的那些有条理的做的与说的(Organized doings and sayings)之集合”^[41]。简单来理解,社会实践就是有条理的行动构成的实体,它们没有固定的形态,且总是分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社会实践具有社会性,它们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由一群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故社会实践也可简称实践。需澄清的是,实践论关注的是一种狭义上实践,它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泛指一切社会行动的广义上的实践有所区别^①。具体来说,实践论关注的实践是吃饭、穿衣、居住、出行、消遣这些社会生活中的惯例,将它们看作是实体并加以考察分析。此外,实践还具有物质性,即实践的开展总与特定的物质性安排相勾连,甚至有实践理论家认为物质本身也是实践的构成内容^[42-43]。

截至目前,实践论的理论建构工作仍在进行,尚未形成一套一致的理论表述。学术界目前流行着多个版本的实践论,这些理论脱胎于不同思想流派和学科背景,理论目标各有侧重,采用了多样化的分析概念,甚至对部分关键概念的定义也未能达成一致。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唯有借用“实践理论丛”(Theories of practice)的标签才足以反映该领域目前的变异性^[44]。尽管各个版本的实践理论截然不同,但大体上却共同秉持了如下几个基本理论预设:第一,社会生活主要是由各式各样的实践构成的;第二,构成社会生活的不同实践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会相互串联并汇聚成一些实践复合体,即实践的束集与群集(Bundles & constellation);第三,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要么是由实践复合体直接构成,要么植根于这些复合体之中;第四,人的行动取决于一些不可言说的实践能力,也可理解为“实践意识”或“默会知识”^[40,45]。正是基于对以上预设的共同承认,实践理论家们才会彼此认同、通力合作,携手创造了实践论的当前繁荣。

实践论属于日常生活理论。在关于日常生活的既有学术讨论中,日常生活的概念经常是与实践的概念相伴出现的。例如,法国社会学者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曾将他的日常生活理论命名为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主张从实践的角度来观察日常生活^[46]。再如,实践理论家莱克威茨分析认为,不同版本的实践理论充满变异性但却又都能够归在“实践论”标签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理论都流露出对“日常性”(The everyday)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共同兴趣^[47]。随着实践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研究者倡导将实践论应用于日常生活研究,认为实践论可以为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世俗的、常识性的、习惯性的社会行动提供一个更好的角度^[48]。

^①在德语中,狭义的实践对应的单词是 praktiken,而广义的实践对应的单词则为 praxis,较为容易区分,而在英语世界,实践理论家们用复数的实践单词 practices 来指代狭义的实践,用单数的实践单词 practice 来表达广义的实践概念。

2. 实践视阈下的乡村日常生活与环境变化

实践论对我们开展关于我国乡村日常生活与环境变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启示体现在对社会分析单位的锚定上,即将洗衣、做饭、居住、出行、务农等实践作为乡村日常生活的核心分析单位,并基于日常实践的特质来解释乡村环境变化。具体而言,以日常实践为基础的环境变化研究的独特性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

(1) 找回乡村日常生活的物质性,揭示日常实践再生产的隐蔽环境影响

实践论认为实践具有物质性,可以表现为实践通常会涉及一定质或量的物质消耗。例如,日常生活中许多实践活动(如洗衣、做饭、出行)往往伴随着对水、空气、能源、原材料等物质的消耗^①。日常实践带来的物质消耗过程由于不起眼(Inconspicuous)而往往难以被察觉,某项实践消耗的物质在短时间内通常也不足以立即引起显著环境变化^[45]。但日常实践的物质消耗具有累积性,在一些情况下,产生的环境影响会明显叠加,例如,消耗的物质本身具有稀缺性,日常生活中诸多实践的开展都高度依赖某种物质,实践者规模的扩大,等等。当日常实践消耗的某种物质质量到达一定水平并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时,便很可能导致环境退化问题。

在既有乡村环境变化研究中,研究者们聚焦于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等乡村社会的宏观转型进程给生态系统运行带来的显著干扰,而容易忽视微观日常生活中那些隐蔽且微小的物质消耗所具有的累积效应。以实践作为核心分析单位的环境变化研究提示我们,即便是在前现代农业社会,乡村日常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一直在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累积发生,一些环境变化隐藏在乡村日常实践的再生产过程中。换言之,很多乡村日常实践的开展都是以物质消耗为前提的,它们对环境的干扰从未消失过,只是因为尚未累积到能够引起显著环境变化的水平而常被忽略。透过实践论的视角,我们可以观察不同乡村日常实践消耗的物质种类和数量特征,进而判断具体有哪些物质密集的实践在显著影响着乡村环境变化。

(2) 顺应乡村日常生活的动态性,将日常实践的绿色重构设定为环境治理目标

如果承认开展日常实践伴随的物质消耗对环境变化的影响,那么,如何有效减少这些物质消耗自然成为环境治理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实践论主张基于实践兴起、延续和消亡的动态性来理解日常生活变迁,任何试图转变日常生活的政策安排都应致力于重构日常实践^[43,49]。如要促进日常生活往环境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环境治理的目标可以锁定为改造那些物质密集的日常实践。具体到环境决策,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尝试识别出那些物质密集的日常实践,并充分理解这些实践的社会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必要的政策干预减少这些实践对物质的消耗,或者推广相对可持续的物质替代原先实践中不可持续的物质,以实现实践的绿色重构。

将日常实践的绿色重构作为乡村环境治理的目标暗含了一种追求乡村社会良性运行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美好愿景。具体来说,乡村环境治理虽然以减缓和遏制乡村环境退化作为终极目标,但却并不一定要以彻底摒弃或中断乡村生活作为达鹄手段(某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因为这会直接冲击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甚至降低村民生活质量,将他们开展日常生活的正常需

^①这些消耗一部分固定下来成了重要的社会景观,如房屋、马路、交通工具等;一些则重新回归到了自然环境中,如固体废弃物、废气、污水等。

求与环境保护直接对立起来。所以,要想实现乡村环境质量的实质改善,环境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那些乡村日常实践的改造上,推动它们朝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就此而言,实践导向的乡村环境治理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类似生态现代化理念的环境治理策略——在不影响乡村日常实践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让它们的环境影响最小化,从而实现乡村日常生活的良性运行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3) 重视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在日常实践中理解其环境行动的动机

实践论认为,人是实践的承载者,实践只有经由人的开展才能得以延续。第一代实践理论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动并不受任何理论性的话语意识支配,而是人在一种无法言明的实践意识监控下开展实践的过程。实践意识即人关于开展特定实践的知识 and 技能,也是人作为实践者能动性的主要体现^[39]。第二代实践理论家们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实践者能动性的论述,认为个体关于特定实践的情感体验也会影响他们对实践的选择和忠诚度^[50-51]。根据实践论对实践者的描绘,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并非个体主义假设的那样是经由理性计算后的选择,也非结构主义认定的那样完全是一种被动反应的结果,而是他们在开展日常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动性之体现。只有深入分析人们开展日常实践的能动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社会行动的动机。

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在乡村环境变化中的作用不应被低估,特别是那些与物质消耗直接相关的行动,如用水、用能、用材等。根据实践论,这些行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特定日常实践中,服务实践的具体开展。例如,洗衣、做饭、洗澡、清洁等乡村日常实践的开展均包含用水的行动,但我们既不能将这些与物质消耗相关的行动还原为乡村居民个体的选择,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改变行动的外在条件就会使得他们做出相应的行动调整,而应该尝试将这些行动作为日常实践的一部分来把握。对日常实践的绿色重构不能忽视乡村居民的能动性:一方面,在乡村地区推广一些更为可持续的日常实践时,要充分考虑乡村居民对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同时要向乡村居民传授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更顺利地接纳和开展可持续的新实践;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对现有日常实践的情感体验也需要被尊重和理解,一些日常实践尽管具有较大的环境影响,但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符号,如果强行将乡村居民与这些实践分离,很容易激起他们的抵触与抗争,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也因此会被削弱。

(4) 跟进乡村日常生活变迁的新趋向,基于跨地域的日常实践关联评估网络化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指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是高度网络化的,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逐渐互相关联,原先相对孤立的地方社会生活开始接入网络社会,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许多实践活动的开展不再受到地理临近性的限制,而能够在更大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得到安排^[19]。实践论虽然擅长分析微观的、小规模的社会现象,但同样可以应用于分析类似于网络化这样宏观的、大规模社会现象^[52]。实践论主张不同的实践之间并非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是会相互关联并构成各种各样的实践复合体^[43,45]。一些实践理论家还指出,实践间的关联并不局限于特定地域范围内,而具有解域性(De-territoriality)。例如,大卫·尼科里尼(Davide Nicolini)提出的“拉远法”(Zoom out)主张从一个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实践间的关联,并特别提醒研究者注意追踪地方实践借助跨地域的实践关联产生的跨地方影响(Trans-local effects of local

practices)^[42, 53], 这与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概念具有亲和性, 我们可以借助对跨地域日常实践关联的分析来考察网络化是如何塑造特定地域内的日常生活的。

对跨地域日常实践关联的考察有助于展现网络化对乡村环境变化的复杂影响。网络化带来了资本、信息、技术、组织互动、声影、符号以及物质跨地域的大量流动, 这些流动构成了实践的一些基本元素并且可以通过网络社会中实践的跨地域关联来影响乡村环境变化。一方面, 跨地域的物质流动表明, 网络社会中乡村日常实践产生的环境影响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 而可能借助网络传递到其他更大空间范围, 乡村环境相对应地也会受到来自乡村社会以外其他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 跨地域的非物质流动可能会诱发乡村日常实践的变迁, 变迁的结果既有可能会加剧乡村环境退化问题, 也有可能为乡村环境治理带来新机遇。概言之, 网络化重塑了乡村环境变化的社会动态过程, 实践论则为研究者们全面评估网络化与乡村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

五、总结与讨论

目前我国乡村环境问题的内生性之维日渐显现, 而国内环境社会学界主流的现代化解释框架对此缺乏关注, 在解释乡村环境变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理论短板。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提示环境社会学重视日常性的社会生活与生物物理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增进对于环境变化的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新兴的实践论为我们考察我国乡村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富有借鉴价值的日常生活视角, 透过对日常实践的分析来拆解不同的乡村环境变化议题, 进而超越现代化解释框架。

需要重申的是,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阐释我国乡村环境变化并不意味着与现代化解释框架的彻底决裂。现代化解释框架在分析当代我国乡村许多环境问题的成因时仍能够有的放矢, 保留了良好的解释效力。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 乡村环境变化研究今后能继续从这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中获益。尽管如此, 我们也要看到乡村环境变化的内生性之维在现代化解释框架中的缺席, 基于该框架, 我们对许多乡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还存在一个“黑箱”, 即乡村内部的社会动态在其环境问题的形成与治理中实际扮演了以及还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践论启发我们将目光聚焦乡村日常生活, 基于对乡村日常实践的分析来拆开“黑箱”, 对乡村内部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与乡村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学术关注。

作为一套尚在争鸣中的理论学说, 实践论目前并不具备完全取代现代化解释框架的实力, 但却可以有针对性地修补该框架的短板。现代化解释框架的一些支持者们并非没有留意到现代化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及连带的环境效应, 但却倾向于认为乡村日常生活“在现代性的大碾车”(The juggernaut of modernity) 面前只能扮演一种“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悲情角色, 乡村日常生活因此也被脸谱化成断裂的、脆弱的、依附的。实践论有助于找回乡村日常生活的承继性、韧性和自主性等面向, 但针对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机制也未能提供任何现成的解释。整体上看, 目前我们对现代化与乡村日常生活之间的具体互动机制还知之甚少。实践理论家夏兹金认为, 实践论属于社会本体论范畴, 它提出了社会生活本质的一种替代解释, 却并不寻求与其他社会本体论(如个体论、互动论、整体论等) 在谁更真实、谁更合理等本身无解的问题上一争高下; 实践论是一个相对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在承认实践是社会生活本体的前提下, 实践论同其他理

论思路与传统完全能够兼容,可以通过建立理论联盟以提升关于特定社会现象的解释力^[40]。鉴于此,今后环境社会学研究并不必要舍弃已相当成熟且实用的现代化解释框架,但可以尝试创造性地引入实践论来探明该框架对乡村内部社会动态过程的解释盲区,旨在更全面且生动地还原乡村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图景。

[参 考 文 献]

- [1]洪大用,马芳馨.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4):1-7.
- [2]李贵宝,尹澄清,周怀东.中国“三湖”的水环境问题和防治对策与管理[J].水问题论坛,2001(3):36-39.
- [3]李政海,鲍雅静,张靖,等.内蒙古草原退化状况及驱动因素对比分析:以锡林郭勒草原与呼伦贝尔草原为研究区域[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5(1):1-5.
- [4]姚伟,曲晓光,李洪兴,等.我国农村垃圾产生量及垃圾收集处理现状[J].环境与健康杂志,2009(1):10-12.
-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36-41.
- [6]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东南学术,2000(5):83-90.
- [7]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62-69.
- [8]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J].战略与管理,2003(3):63-72.
- [9]王晓毅.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2):58-65.
- [10]李华,叶敬忠.谁的水,谁的发展:农村工业中的水资源攫取现象反思——基于对河北省宋村的研究[J].开放时代,2014(3):143-152.
- [11]耿言虎.脱嵌式开发: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1-30.
- [12]麻国庆.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以广东农村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13(5):192-199.
- [13]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14]MOL A P J, SONNENFELD D A.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 [M].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 [15]陈涛,谢家彪.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6(3):25-46.
- [16]吴柳芬,杨奕.基层政府权责配置与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以桂北M镇“清洁乡村”治理项目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2-41.
- [17]唐国建,王辰光.回归生活: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以陕西Z镇5个村庄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4-37.
- [18]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6-343.
- [19]CA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 New Jersey: Wiley, 1996.
- [20]范叶超.环境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环境社会学议程[J].社会学评论,2018(1):56-68.
- [21]邵占鹏.农村电子商务中的空间压缩与价值[J].学习与探索,2017(2):49-56.
- [22]郑震.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1):65-88.
- [23]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J].社会,2009(1):162-172.
- [24]郑震.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人文杂志,2016(5):106-115.
- [25]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 [26]ADLER P A, ADLER P, FONTANA A. Everyday life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7, 13: 217-235.
- [27]LEFEBVRE H, LEVICH C. 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87, 73: 7-11.
- [28]ZERUBAVEL E.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ilence and denial in everyday lif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2006.
- [29] PINK S. Situating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and plac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2.
- [30] KALEKIN-FISHMAN D.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J]. *Current Sociology* 2013(5/6): 714–732.
- [31] LÖFGREN O. The black box of everyday life: entanglements of stuff , affects and activities [J]. *Cultural Analysis* 2014 (13): 77–98.
- [32] SZTOMPKA P. The focus on everyday life: a new turn in sociology [J]. *European Review* 2008(1): 23–37.
- [33] JACOBSEN M H. The everyday: an introduction to an introduction [M] //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es of the unnotic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41.
- [34] 彭远春.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8): 140–145.
- [35] MANIATES M F. Everyday possibiliti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2(1): 121–125.
- [36] RØPKE I. New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social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 403–422.
- [37] SPAARGAREN 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 theoreti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perspective [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3(8): 687–701.
- [38]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39]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 [40] SCHATZKI T R. On practice theory , or what’s practices got to do (got to do) with it? [M] // *Education in an era of schooling*.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151–165.
- [41] SCHATZKI T R. Social change in a material world [M]. London: Routledge 2019: 28.
- [42] NICOLINI D. Zooming in and out: studying practices by switching theoretical lenses and trailing connection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9(12): 1391–1418.
- [43] SHOVE E , PANTZAR M , WATSON M.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ractice: everyday life and how it chang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2.
- [44] WARDE A. Consumption and theories of practice [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05(2): 131–153.
- [45] SCHATZKI T R. A primer on practices: theory and research [M] // *Practice-based education: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13–26.
- [46]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47] RECKWITZ A.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2): 243–263.
- [48] VAN TIENOVEN T P , GLORIEUX I , MINNEN J. Exploring the stable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a multi-day time-diary approach [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4): 745–762.
- [49] STRENGERS Y , CECILY M. Social practices , intervention and sustainability: beyond behaviour chang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50] SCHATZKI T R. Practices and people [J]. *Teoria E Prática Em Administração (TPA)* 2017(1): 26–53.
- [51] WEENINK D , SPAARGAREN G. Emotional agency navigates a world of practices [M] //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soci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76–100.
- [52] SCHATZKI T R. Keeping track of large phenomena [J].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2016 ,104: 4–24.
- [53] NICOLINI D. Practice theory , work ,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责任编辑 章 诚]

Understanding Endogeneity: A Study on Practice Theory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FAN Yechao

Abstract: Nowadays, the endogenous dimension of China'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mainstream moder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has exposed obvious limitation in its insufficient study in this regard. The shift of attention to daily life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remind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ooted in daily life and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daily life. As a theory of daily life, theory of practice emerging in the western social theoretical field advocates interpreting social life and social phenomena based on daily practice,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idea of exploration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daily lif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but also casts light on the current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the effective explanation of moder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e theory can make up for its theoretical insu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r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Practice Theories in Social Sciences

WANG Xiaoyi

Abstract: Practice theories advocat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practice, but this excellent tradition has gradually been discarded in the pursuit of normativity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ulting in the prevalence of dogmatic and "fast-f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actice theori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through in-depth and extensive empirical studies, and focusing more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rooted in people's everyday life, while avoiding "fast-food"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Perceptual Dimension of Social Practice Theories

LU Chuntian

Abstract: Practice theories, emerging in Wester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dvocates to explain the society-environment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materiality of practices, and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everyday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a clear explanatory shortcoming in practice theories in terms of the long-standing disparity between everyday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with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order to bring back the role of perceptions in triggering changes in everyday practices, researchers should choose a considerate length of time as the unit of observ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everyday practices, and include regional specificities while analyzing changes.

Impact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Market Respons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LI Yan, YU Yang, GONG Dawei, WANG Xintia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ose in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bear greater pressure o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role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market respons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inspectors 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of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costs to the market. This study takes enterprises in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as sample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the investment market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 is an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enterpris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investors, and the correc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untervailing the market distortion is germinating. The investment market has different responses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he CAR rat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information, and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unleas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we must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NG Jiafeng, BI Miao

Abstract: 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of 11 provinces and 11 municipa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10 to 2017 with the random-effects model,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D investment, opening-up level and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R&D invest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while the level of openness and patent accepta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Therefor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must strength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ase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the entire river basi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river basin, so a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Research on Driving Facto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ree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oot Cause Analysis: Th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

REN Xiangwei, SUN Liwen, XING Liyun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most scholar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ining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 but ignore the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ir importance, which leads to limited reference and guidance to the practi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adopts root cause analysis, collects data from typical cases and some documents, mines 80% of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ith affinity diagrams, fish bone diagrams and Pareto analysis, and combines and sequenc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order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ource elements, environmental elements,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ideological change, expected income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driv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can be further summarized into factor-driven category, behavior-driven category and goal-oriented categor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and ad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In general, the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enterpris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well.